

Le Carnaval de Romans

罗芒 狂欢节

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

1579 — 1580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Le Carnaval de Romans

罗芒 狂欢节

从圣烛节到圣灰星期三

1579 — 1580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芒狂欢节/ (法)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 许明龙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265-4

I. ①罗… II. ①勒… 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85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罗芒狂欢节

〔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 著
许明龙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265-4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4 3/4 插页 2
定价: 42.00 元

前言^①

罗芒曾是法国的一个纺织业中心，位于里昂南面从前叫做多菲内省的那片土地上。这个小城 16 世纪的人口约为 8 000 人。每年二月的丰盛星期二狂欢节，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多姿多彩的活动。1580 年的狂欢节盛况胜过往常，但却演变成了一场显贵对工匠的血腥伏击，工匠的首领们或是被杀，或是被投入牢狱。当其时，法兰西正陷于宗教战争的剧烈动荡之中，这次由民众欢庆活动演变而成的暴力事件，犹如一支火箭炸响在法兰西上空。据当年记述，这次罗芒事件兼具莎士比亚悲剧和街头小戏的特点，主角则是男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个事件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和文化史意义。但是，对于居住在远离法国南部的兰开夏、纽约、明尼苏达等这些城市中的读者来说，罗芒狂欢节事件有什么值得他们关注的呢？

若想充分估量罗芒狂欢节事件的重要性，首先不能忘记，此次事件发生在宗教战争的两个重要阶段相交之际，法国的宗教战争是 16 世纪下半叶发生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战争，整个法兰西和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卷入其中。

① 译自《罗芒狂欢节》英译本： *Carnival in Romans*, Phoenix Press, 2003, London。——译者

自 1560 年起在法国占据上风的胡格诺派（Huguenots）1572 年在臭名昭著的圣巴特洛缪之夜大屠杀中遭受重创，身心俱伤的新教从此每况愈下，无望东山再起。从 1580 年开始，一个庞大的以“联会”（League）为名的天主教组织声势日渐壮大；有人误以为原教旨主义已经在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沉重打击下奄奄一息，其实它并未失去民心，而是在声势日盛的联会推动下，以胜利者的姿态毫发未损地重现江湖，保持着从前那副宗教狂热的面貌。天主教联会在原教旨主义推动下大量涌现，大贵族吉斯家族对于这个组织的领导其实有名无实，狂热的僧侣和布道修士才是这个组织的基础。这是一个近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组织，它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是一个民主的、前革命的、受操纵的乃至集权主义的组织。

罗芒狂欢节事件发生在上述这些事态发展的前夜，正如我刚才所说，它发生在激烈的宗教战争两个阶段的衔接处，即胡格诺阶段（1560—1572）和天主教阶段（1580 年以后）相交之时。1558 年相对平静，这是极具破坏力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一个台风眼，主导前一阶段的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引领后一阶段的则是罗耀拉（Loyola）的思想。罗芒狂欢节前后盛极一时的多菲内（Dauphiné）起义民众联会的首领，除极少数例外，既非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也不是僧侣，而是工匠、农民和资产者，他们都致力于捍卫各自的行业和社会利益，准备必要时为此而战。

就其基础层面而言，罗芒狂欢节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地区性起义中的高潮阶段，是一场对抗政府和税收的反叛。在 16 和 17 世纪的西方世界中，此类反叛屡见不鲜，主要在法国，其次在英国和西班牙。在当时的知识精英论者看来，这些反叛所体现的是原始农民阶级极具野性的冲动。此类反叛活动如今被称作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布热德主义指

的是一种只顾眼前的政治态度，这个词源于皮埃尔·布热德，此人曾在二战后领导了一场以小商人和熟练工人为主的联盟运动。在世界上的先进社会之一的加利福尼亚，也发生过抗税运动。就第13条提议举行的投票表明，抗税运动通常非常复杂，其实在16世纪的法国也是如此。正如帕金森法（Parkinson's Law）所指出，官僚政治如果不受监督就会日益恶化，就上面谈及的这个实例而言，其结果便是税收名目越来越多，税额越来越高。1580年的多菲内是一个抗税和反贵族斗争的舞台，贵族享受着与生俱来的免税特权，平民、农民以及资产者对此愤懑不平，他们憎恨税收，更仇视税收方面的不公正。因税收不公而引起的对贵族的愤恨犹如井喷，一发而不可收；在卢梭的平等思想中得到充分表达的这种愤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再度喷发。

不过，1580年多菲内的起义还有其久远的根源，那就是中世纪反抗领主的斗争；反抗领主的斗争在18世纪最后十年间有了完全属于近代的崭新意义。1579年多菲内的造反农民袭击并捣毁领主庄园，在此前的1358年扎克雷起义中和此后令人胆战心惊的1789年春季，都发生过此类事件。

罗芒是冲突的焦点。在地方层面上，工匠们借助行会向当地以政治强人法官盖兰为首的城市贵族发起挑战。1580年2月，狂欢节如期举行……于是一切都变样了。在冬春相交时节举行的狂欢，勾起了人们对往日的回忆，那时人们在骤然爆发的纵情欢乐中埋葬了不信教的日子，成为基督教徒。人们以这种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封斋期做好准备，而封斋期则是一个以复活节洗礼为高潮的净化的过程，是心灵诞生或再生的时节。为丰盛星期二而制作的模拟人像遭到审判并被处死，这是放纵无度的异教徒狂欢活动至此终结的标志。但是，狂欢节也与社会罪恶或灾难有关，不幸的是，人们很难就什么是社会的罪恶或灾难达成共识。换

言之，消灭社会灾难就意味着阶级斗争，一方是贪婪的显贵，另一方是造反的农民。双方都成群结队地、气势汹汹地来到狂欢节，通过表演和礼仪活动彼此激烈争斗，最后以一场血腥的屠杀告终。

罗芒狂欢节尽管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方事件，却深刻地揭示了往昔文化中的各个层次。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和一个与众不同的省份。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罗芒狂欢节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巴洛克时代初期和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兴起之时的一出文艺复兴的城市活剧。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城乡概况	5
第二章	税收：平民向贵族抗争	49
第三章	1576年：让·德布尔格的陈情书	76
第四章	1578年：雅克·科拉审慎的造反	97
第五章	1579年：球王塞尔弗的首届狂欢节	112
第六章	1579年：抗税和债务	183
第七章	1580年：罗芒的民俗大师安托万·盖兰	209
第八章	1580年：丰盛星期二或上帝与我们同在	271
第九章	虐杀农民的屠戮场	294
第十章	“喜鹊和乌鸦啄去了我们的眼珠子……”	309
第十一章	范型、会社、“王国”	336
第十二章	冬天的节日	357
第十三章	再说农民	384
第十四章	追求平等的先民	399
鸣谢		441
译名对照表		442
参考书目		451
手稿与抄本		467

前言^①

罗芒曾是法国的一个纺织业中心，位于里昂南面从前叫做多菲内省的那片土地上。这个小城 16 世纪的人口约为 8 000 人。每年二月的丰盛星期二狂欢节，这里都要举行盛大的、多姿多彩的活动。1580 年的狂欢节盛况胜过往常，但却演变成了一场显贵对工匠的血腥伏击，工匠的首领们或是被杀，或是被投入牢狱。当此时，法兰西正陷于宗教战争的剧烈动荡之中，这次由民众欢庆活动演变而成的暴力事件，犹如一支火箭炸响在法兰西上空。据当年记述，这次罗芒事件兼具莎士比亚悲剧和街头小戏的特点，主角则是男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个事件都具有很强的社会和文化史意义。但是，对于居住在远离法国南部的兰开夏、纽约、明尼苏达等这些城市中的读者来说，罗芒狂欢节事件有什么值得他们关注的呢？

若想充分估量罗芒狂欢节事件的重要性，首先不能忘记，此次事件发生在宗教战争的两个重要阶段相交之际，法国的宗教战争是 16 世纪下半叶发生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一场激烈的战争，整个法兰西和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都卷入其中。

① 译自《罗芒狂欢节》英译本：*Carnival in Romans*, Phoenix Press, 2003, London。——译者

自 1560 年起在法国占据上风的胡格诺派（Huguenots）1572 年在臭名昭著的圣巴特洛缪之夜大屠杀中遭受重创，身心俱伤的新教从此每况愈下，无望东山再起。从 1580 年开始，一个庞大的以“联会”（League）为名的天主教组织声势日渐壮大；有人误以为原教旨主义已经在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沉重打击下奄奄一息，其实它并未失去民心，而是在声势日盛的联会推动下，以胜利者的姿态毫发未损地重现江湖，保持着从前那副宗教狂热的面貌。天主教联会在原教旨主义推动下大量涌现，大贵族吉斯家族对于这个组织的领导其实有名无实，狂热的僧侣和布道修士才是这个组织的基础。这是一个近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组织，它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是一个民主的、前革命的、受操纵的乃至集权主义的组织。

罗芒狂欢节事件发生在上述这些事态发展的前夜，正如我刚才所说，它发生在激烈的宗教战争两个阶段的衔接处，即胡格诺阶段（1560—1572）和天主教阶段（1580 年以后）相交之时。1558 年相对平静，这是极具破坏力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一个台风眼，主导前一阶段的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引领后一阶段的则是罗耀拉（Loyola）的思想。罗芒狂欢节前后盛极一时的多菲内（Dauphiné）起义民众联会的首领，除极少数例外，既非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也不是僧侣，而是工匠、农民和资产者，他们都致力于捍卫各自的行业和社会利益，准备必要时为此而战。

就其基础层面而言，罗芒狂欢节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地区性起义中的高潮阶段，是一场对抗政府和税收的反叛。在 16 和 17 世纪的西方世界中，此类反叛屡见不鲜，主要在法国，其次在英国和西班牙。在当时的知识精英论者看来，这些反叛所体现的是原始农民阶级极具野性的冲动。此类反叛活动如今被称作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布热德主义指

的是一种只顾眼前的政治态度，这个词源于皮埃尔·布热德，此人曾在二战后领导了一场以小商人和熟练工人为主的联盟运动。在世界上的先进社会之一的加利福尼亚，也发生过抗税运动。就第13条提议举行的投票表明，抗税运动通常非常复杂，其实在16世纪的法国也是如此。正如帕金森法（Parkinson's Law）所指出，官僚政治如果不受监督就会日益恶化，就上面谈及的这个实例而言，其结果便是税收名目越来越多，税额越来越高。1580年的多菲内是一个抗税和反贵族斗争的舞台，贵族享受着与生俱来的免税特权，平民、农民以及资产者对此愤懑不平，他们憎恨税收，更仇视税收方面的不公正。因税收不公而引起的对贵族的愤恨犹如井喷，一发而不可收；在卢梭的平等思想中得到充分表达的这种愤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再度喷发。

不过，1580年多菲内的起义还有其久远的根源，那就是中世纪反抗领主的斗争；反抗领主的斗争在18世纪最后十年间有了完全属于近代的崭新意义。1579年多菲内的造反农民袭击并捣毁领主庄园，在此前的1358年扎克雷起义中和此后令人胆战心惊的1789年春季，都发生过此类事件。

罗芒是冲突的焦点。在地方层面上，工匠们借助行会向当地以政治强人法官盖兰为首的城市贵族发起挑战。1580年2月，狂欢节如期举行……于是一切都变样了。在冬春相交时节举行的狂欢，勾起了人们对往日的回忆，那时人们在骤然爆发的纵情欢乐中埋葬了不信教的日子，成为基督教徒。人们以这种方式为即将到来的封斋期做好准备，而封斋期则是一个以复活节洗礼为高潮的净化的过程，是心灵诞生或再生的时节。为丰盛星期二而制作的模拟人像遭到审判并被处死，这是放纵无度的异教徒狂欢活动至此终结的标志。但是，狂欢节也与社会罪恶或灾难有关，不幸的是，人们很难就什么是社会的罪恶或灾难达成共识。换

言之，消灭社会灾难就意味着阶级斗争，一方是贪婪的显贵，另一方是造反的农民。双方都成群结队地、气势汹汹地来到狂欢节，通过表演和礼仪活动彼此激烈争斗，最后以一场血腥的屠杀告终。

罗芒狂欢节尽管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方事件，却深刻地揭示了往昔文化中的各个层次。它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和一个与众不同的省份。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罗芒狂欢节让我们看到的是：在宗教改革时期、巴洛克时代初期和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兴起之时的一出文艺复兴的城市活剧。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一个小城撰写一部历史，譬如说，多菲内的罗芒。罗芒是我时常欣喜地想起的小城，多菲内则是一个省，我热爱那里的居民和景色。多菲内有着七八百年乃至更悠久的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市政史……档案资料汗牛充栋……一番思索之后，我发现这个题材相当广阔，专题研究者难以胜任，何况我尚在为成为一个专题研究者而发奋努力呢！经过一番仔细斟酌，我决定只写罗芒的十五天历史，也就是短短的两周。可是，这是什么样的两周啊！这两周就是1580年2月的罗芒狂欢节。在狂欢节期间，伊泽尔河两岸的居民先是精心打扮，接着相互厮杀。这是躁动不安、绚丽多彩和血腥杀戮的十五天，有必要追述这场悲剧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阐明事件发生的环境及其意义，必要时还应该对周边的城市和村庄进行一番审视，其中包括从比较史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狂欢节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便是本书的缘由。在开篇的第一章中，我将扼要地讲述1579—1580年间罗芒的状况，其实也是罗芒周边的多菲内乡村地区的状况；其次，我要说一说1580年2月那场悲剧的政治—社会背景。在这一章中将会涌现大量数据，我请大家对此给予谅解，为了清晰地勾勒出一场悲剧的背景，数据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历史有时候也是数量史。不过请大家放心，大量数据并非全书的特点。

- 10 伊泽尔河畔的罗芒距罗讷河仅数法里，这座小城在数百年间的人口发展状况，乃是城市人口学上的常见现象。1348 年黑死病大流行之后，^① 1357 年罗芒有 1 163 个纳税人户主；以每户平均 4.5 人计，加上未统计在总户数中的非纳税人家庭（特权享有者和赤贫者等），全城居民总数约为 6 013 人。^② 造成人口大减的 1361 年瘟疫过后，只有 430 个户主出席 1366 年的罗芒选举大会，若仍以每户平均 4.5 人计，此时居民总数应是 2 233 人。^③ 这个数字肯定偏低，因为那一年有很多户主把选举大会“晾”在一边，拒不出席。1450 年的数字比较可靠，登记在册的总户数为 529（不是纳税户，而是实有户），居民总数为 2 735 人，^④ 少于一百年前在册人数的一半。历经瘟疫、战争、饥谨和危机的罗芒每况愈下，到了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人口几乎跌到了谷底。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如同别处一样，文艺复兴在罗芒从 1498 年开始初露端倪。全城的直接税纳税人增为 814 人，居民总数增为 4 208 人。11 年之后，这两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动，纳税人 815 人，居民总数 4 214 人。^⑤ 一度受到遏制的文艺复兴扩展势头重新启动，40 年后有了长足发展；1557 年罗芒的直接税纳税人为 1 612 人，比本世纪初几乎翻了一番；居民总数已达 8 334 人。^⑥ 罗芒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万，堪称那

① 德龙省档案，E 1169（=罗芒市档案 II 4）。

② 马蒂娜·佩罗歇（Martine Perrochet）在她论述 15 世纪罗芒的未版论文中，以每户平均 5 人计算，未统计在人口总数中的特权享有者和赤贫者换算为 0.67 人，两者相加为 5.67。用这个系数求得的当时罗芒总人口为 6 594 人。我保留她的 0.67，但把她的 5 调整为 4.5，两者相加为 5.17。不过，这些数字也仅是约略而已。

③ 德龙省档案，E 3592，1366 年。

④ 数字来源为马蒂娜·佩罗歇关于 15 世纪罗芒的未版论文（论文手稿藏于罗芒市立图书馆）。

⑤ 罗芒市档案，CC，各该年份的直接税册；托梅·德·迈松纳夫《罗芒史》（Thomé de Maisonnewe, *Histoire de Romans*），第 2 卷，第 571 页。

⑥ 罗芒市档案，CC 81。

个时代的“小型大城市”。延续到1550年代的这一波人口增长，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里得到反映，其中包括青楼。“鉴于有伤风化的事件越来越多，因而必须扩大妓院规模，以便容纳更多的娼妓和窑姐”（1554年4月市议会讨论记录）。^①九年之后的1566年，宗教战争已经开始，两年前的1564年发生了瘟疫。^②文艺复兴的增长势头逆转为其反面，这一年罗芒只有1519个纳税人，7853个居民。^③1570年，人口下降危机继续发展，恶魔般的战争还在继续，田园荒芜，人口流失，罗芒尚余1454个纳税人，7517个居民。^④1578年罗芒的人口进一步下降，纳税人减为1304人，居民减为6742人。在本书记述的狂欢节之后，1582年的罗芒有纳税人1582人，居民6902人。^⑤自1557年以来，罗芒的总人口第二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跌落到7000人这条“杠杠”以下。不过，这些年头的数字可能略有低估。1583年的直接税册倒是做得认真仔细，统计在税册中的纳税人为1547人，居民为7998人，粗略地说就是8000人，^⑥即平均每公顷212人。经历了1586年恐怖的瘟疫之后，1588年的人口大幅下降，纳税人仅为1183人，居民不足6000人。^⑦本书记述的罗芒狂欢节是在宗教战争期间和人口周期中的下降和停滞阶段

① 罗芒市档案，BB，这个时期的资料（感谢罗西奥（M. Rossiaud）先生热情提供）。

② 从1564年6月到1565年1月的瘟疫流行期间，死于瘟疫的罗芒人约为4000人（德龙省档案，E3667）。从1566年到1557年，罗芒人口急剧萎缩；尽管由于乡民涌入城市和寡妇再婚后立即受孕并生育，致使人口迅速得到部分补充，但人口减少的趋势并未得到逆转。（参见G. 德里伊（G. Delille）的相关论文）

③ 罗芒市档案，CC，1566年直接税册。

④ 罗芒市档案，CC90，1570年直接税册。

⑤ 罗芒市档案，CC90。1578年直接税册的编号为罗芒市档案CC92。

⑥ 罗芒市档案，CC94。在15世纪，将郊区排除在外的罗芒城墙内的总面积为37.68公顷（感谢弗朗希娜·马莱女士（Mme Francine Mallet）提供此数字）。

⑦ 罗芒市档案，CC361。我之所以把总人口估算为不足6000人，是考虑到经历了瘟疫之后，每户平均人口也有所减少。

举行的，而此前 1450—1560 年间的文艺复兴或“美好的 16 世纪”，则是这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狂欢节举行之时，罗芒拥有居民约 7 500 人，至多不超过 8 000 人。

在 16 世纪的法国城市中，罗芒属于人口总数约在 6 000 人到 12 000 12 人之间的第五等。巴黎属于第一等（当时的人口介于 200 000-300 000 人）。里昂属于第二等（60 000 人）。卢昂、南特、波尔多属于第三等（20 000 人左右）。图卢兹、蒙彼利埃、马赛和奥尔良属于第四等（15 000-20 000 人）……^①罗芒以及类似的小城则属于第五等。

*

*

教区户籍册提供的数字比较完整。在教区户籍册付诸阙如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一种令人毛骨悚然，但比较准确的资料中了解当年罗芒的家庭结构，这就是那份阴森森的 1586 年瘟疫死亡名册。^② 这份名册是奉盖兰之命编制的，我在本书中将会一再提到这位名副其实的罗芒城“大老板”。死于这场瘟疫的罗芒人共计 4 096 人，超过当时该城居民总数的一半（51%）。罗芒因此而萧瑟凋敝，呈现出一幅令人难以想象的惨状。这场在城里蔓延的瘟疫令人想起 1348 年黑死病猖獗时的悲惨情景。许多反抗分子在 1580 年的狂欢节中幸存下来了，却没有逃过 1586 年那场瘟疫。最终为狂欢节事件画上句号的是六年后的这场瘟疫。罗芒的人口在瘟疫之后迅速回升，究其原因，是寡妇再婚和较高的生育力，以及周边乡民大量涌入城内等因素使然。

罗芒人在 1586 年的瘟疫中死了一半，富人穷人概莫能外。对于某些家庭结构而言，这场瘟疫相当于一次高抽样率（51%！）和高效率的

① 参阅加斯孔《16 世纪里昂的大商业与城市生活》（R. Gascon, *Grand commerce et vie urbaine à Lyon au XVI^e siècle*），巴黎，1971 年，第 1 卷，第 350 页。

② 德龙省档案，E 3804。

普查。瘟疫殃及 703 个核心家庭（由夫妻及子女组成，不包括上代及同辈）、84 个寡妇单亲家庭以及至少 161 个扩大家庭；所谓扩大家庭是考虑到死者的身份而言的，共同生活在这个家庭中的人员，除夫妻及其子女外，还包括一位上辈（祖父或外祖父）或一位单身的同辈（夫或妻的兄弟）。倘若忽略不计寡妇单亲家庭，而只考虑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 $703+161=864$ ），那么，扩大家庭所占比例至少为 18.6%（ $161/864$ ），而核心家庭的比例则高达 81.4%（ $703/864$ ）。我之所以说扩大家庭“至少”占 18.6%，是因为在我称之为核心家庭的某些家庭中，实际上有夫妻的一位长辈或同辈共同生活，这些“外来成员”逃过了瘟疫之劫，谁也不清楚他们此后的状况，只是因为他们的某人在 1586 那年死去了，¹³人们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人！再者，依据持续不断地运行的家庭周期规律，许多核心家庭在其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先后变成了扩大家庭。共同生活的一位老祖母一旦过世，原来的扩大家庭立即变成了核心家庭；反之，大儿子婚后不愿带着新婚妻子离开父母，这个原来的核心家庭立即就变成事实上的扩大家庭。如此说来，在 1580 年代的罗芒，每十个家庭（核心家庭+扩大家庭）中就有两个扩大家庭，这个数字看来是合理可信的。这情形与以个人为重的近代英国大不相同，那里几乎只有夫妻型的核心家庭。^① 罗芒的家庭结构与地中海地区比较相似，那里的人们历来喜欢“大家庭”。

在罗芒，富裕家庭在扩大家庭中所占比例较高，这是因为富裕家庭条件较好，除了夫妇和子女外，还有能力供养一位单身汉或上了年纪的长辈，让他们以族人身份在同一个屋檐下体面地过日子。在总共 161 个扩大家庭中，占 32.3% 的 52 个扩大家庭雇有一个或多个佣人，佣人以

① 拉斯莱特：《昔日的家和家庭》（P. Laslett, *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